

区域合作与一体化专题

美墨经济一体化进程中的供应链转移 与中国供应链安全*

姜玉妍 刘学东 徐沛原

内容提要：自2018年中美贸易摩擦爆发以来，全球供应链格局加速演变。美国以“去中国化”为核心进行战略调整，通过关税壁垒、技术限制与同盟重构等手段，推动供应链向区域化转型。在《美墨加协定》框架下，美墨经济一体化进程持续深化。墨西哥凭借地理优势与政策红利，顺势推出“墨西哥计划”以进一步承接近岸制造业转移。随着制造业产能向北美加速转移，中美之间的贸易份额不断下降。在此背景下，中国的出口结构呈现出更加多元化的发展态势。同时，在全球供应链体系中，中国仍占据中间品供应的关键地位，高端制造领域也在外部压力推动下加速实现技术突破。当前，面对全球供应链重组的趋势，中国亟须构建更具韧性的供应链安全体系，通过强化自主创新能力、推动国内与国际市场双循环、加快在墨西哥的本土化布局并切实规避在敏感产业中的依赖风险，提升整体供应链的稳定性与抗压能力。

关键词：供应链 美墨一体化 中美“脱钩” 制造业

作者简介：姜玉妍，郑州大学外国语与国际关系学院讲师；刘学东，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经济系终身教授；徐沛原，清华大学国际与地区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中图分类号：F7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6649 (2025) 04-0060-21

* 本文是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课题“独立以来拉美主要国家的社会转型研究”（编号：19JJD770007）的阶段性成果。

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供应链管理成为衡量国家与企业竞争力的关键指标。随着中美贸易战的持续升温及科技竞争的激化，中美双边关系中的竞争性逐渐超越了合作性。这将进一步推动美国的“脱钩”政策，使全球供应链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为实现与中国“脱钩”，美国确立了供应链多元化的战略，逐渐将目光转向邻国墨西哥，寻求对墨政治和经济关系的双重优化。在《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向《美墨加协定》（USMCA）过渡的过程中，美国与墨西哥之间的经济一体化^①不仅重塑了北美的经济版图，在地理和战略上也触发了一系列深远的供应链重塑。在此背景下，深入剖析美墨经济一体化进程中供应链的转移逻辑，对中国供应链的安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与政策价值。目前关于中国供应链安全问题，国内学者的研究主要从中美竞争与合作以及全球视角下的中国供应链安全两个角度进行。

从中美竞争与合作的角度来看，在全球化日益深入的当下，美国的供应链政策及其对中国的影响已成为国际政治与经济领域的核心议题。在国际形势深刻变化、美国霸权地位动摇的背景下，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打出“组合拳”，全方位压制中国，并制定了“蚕食”策略、局部“脱钩”策略、同盟封锁策略和区域排挤策略四大新策略，试图削弱中国的影响力^②，通过制造业回流、近岸外包与友岸外包等方式，不断重塑全球产业格局并通过加强与盟友的合作来达到排挤中国的目的。^③ 美国对中国的“排华”政策不断升级，涵盖了多边与单边措施，增加了全球供应链的对抗性。^④ 在美国实施“去中国化”政策并推动供应链重组的背景下，中国正面临一系列严峻挑战，主要包括核心技术“卡脖子”问题、产业基础和制造能力受到削弱，以及全球供应链断裂所带来的溢出效应。^⑤ 美国对核心技术的封锁加深了中国对国际市场中间品的依赖，加剧了中国供应链的风险，但同时也倒逼中国产业链提升

① “美墨经济一体化”指的是美国和墨西哥两国在生产、贸易、投资、劳动力、金融等多个经济领域形成高度依赖与协同的结构性关系。这一过程不仅体现为贸易总量的增长，更体现在产业链、供应链的深度融合与政策或制度的趋同，构成一种区域性的经济共同体。

② 张杰、陈容：《中国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的风评估与应对策略》，载《改革》，2022年第4期，第12-20页。

③ 蔡宏波、郑涵茜、余天赐：《美国“去风险”对中国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的影响及应对》，载《财经问题研究》，2024年第1期，第33-34页。

④ 罗长远：《美国供应链“排华”：制约因素和应对策略》，载《开放导报》，2023年第2期，第79-85页。

⑤ 沈尤佳、陈若芳：《中美竞争背景下中国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困境与出路》，载《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8期，第79-96页。

自主创新能力。^①

从全球视角来看，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的安全对中国至关重要。随着地缘政治斗争的形式变得越来越多样化，贸易战、金融战、能源与技术控制以及跨国政治干预等因素都对全球供应链的稳定性造成了显著影响，促使各国开始重新调整经济战略布局。^② 在全球贸易保护主义和俄乌冲突等因素的影响下，全球价值链呈现出从全球化向区域化、从高度集中向多元化、从劳动力偏好向数字化驱动、从市场化竞争向政治化角逐转变的新趋势。^③ 目前，亚洲、欧洲和美洲已成为全球供应链的三大核心区域，其中中国、德国和美国分别为区域内的关键供应链节点。^④ 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依旧控制着全球供应链的高端部分，而中国的产业大多定位于供应链的较低端，产品附加值整体上仍偏低。因此，中国在全球供应链治理中所扮演的角色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⑤

当前多数研究聚焦于中美之间的供应链对比，或从全球宏观视角探讨中国的供应链安全问题，尚需进一步聚焦于“美墨一体化”这一关键变量对中国的具体影响。在中美贸易摩擦持续加剧的背景下，墨西哥日益扮演起中美之间的“桥梁”角色。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从供应链安全视角出发，考察中美“脱钩”趋势与美墨一体化进程相互叠加对中国供应链格局所带来的长期影响，分析墨西哥在这一转型过程中的关键节点与战略地位，据此提出针对中国供应链安全的策略。

一 供应链安全的界定与影响因素

在全球价值链高度交织与地缘政治风险加剧的背景下，供应链安全日益成为国家战略安全与经济稳定的重要议题。如何科学界定其内涵，厘清影响供应链安全的关键因素，已成为当前学术界和政策界关注的焦点。

① 蒋瑛、谢勇、常群：《美国制造业回流对中国供应链安全的影响研究》，载《亚太经济》，2023年第2期，第75-86页。

② 张兴祥、杨子越：《地缘政治冲突与全球供应链安全及中国的应对策略》，载《亚太经济》，2023年第2期，第1-10页。

③ 徐金海、夏杰长：《全力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基于全球价值链视角》，载《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学报》，2023年第11期，第48-63页。

④ 杨继军、金梦圆、张晓磊：《全球供应链安全的战略考量与中国应对》，载《国际贸易》，2022年第1期，第51-57页。

⑤ 徐金海、夏杰长：《全力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基于全球价值链视角》，载《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学报》，2023年第11期，第48-63页。

（一）供应链安全的界定

作为一个跨学科概念，供应链安全在经济学视角下侧重于效率与风险成本，在管理学中强调运营连续性，而在国际关系领域则聚焦于战略自主性。尽管学界尚未形成统一定义，但随着全球供应链的重构，这一议题已引发日益广泛而深入的讨论。本文借鉴郎昆与赵可金的研究思路，将供应链安全上升至国家安全的战略高度，从内向安全、外向安全与系统安全三个维度进行分析，系统地理解其内涵与特征。^①

供应链的内向安全强调一国对外部冲击的抵御能力，主要取决于其对外依赖程度与供应链多元化水平，对外依赖度越高、集中度越强，其脆弱性就越大，安全水平越低。如一国对某类关键中间品过度依赖单一进口来源，在突发事件（如地缘冲突或自然灾害）下将面临较大断供风险。供应链的外向安全体现一国在全球供应链网络中的结构性影响力。处于供应链“中心位置”的国家，往往具备通过标准设定、技术垄断或关键节点控制形成的“非对称性依赖”能力，进而将其转化为国家权力资源。例如，美国在高端芯片设计软件与设备领域的技术优势，使其具备对特定国家实施“断供制裁”的能力，从而构成其外向安全的重要支柱。供应链的系统安全则指全球供应链体系在面对突发冲击（如疫情、战争、极端气候等）时的自我修复能力与有序运行机制，它强调全球制度协调、规则对接与危机调控机制的重要性，直接影响全球价值链的连续性与可预期性，是判断全球化韧性与制度约束力的重要指标。

供应链安全的这三个维度虽彼此独立，却相互影响：提升内向安全往往以削弱外向影响力为代价；而强化外向安全则可能破坏系统稳定，诱发制度摩擦乃至结构性冲突。随着美墨经济一体化的深入，供应链安全已不仅关涉传统意义上的“供应稳定性”（即内向安全），更延伸至“地缘经济影响力的投射”（即外向安全）与“区域网络的韧性和制度协调能力”（即系统安全）。尤其是在墨西哥积极承接美国近岸外包战略的背景下，中美围绕关键产业链的博弈愈发激烈，进一步推动供应链安全边界向更加复杂的方向演化。

（二）供应链安全的影响因素

内向安全、外向安全与系统安全作为供应链安全的三个核心维度，分别衡量国家在外部依赖、自身影响力及全球系统稳定性方面的风险承受能力。

^① 郎昆、赵可金：《供应链安全的定义、测算和国际比较》，载《国际政治科学》，2024年第4期，第108-134页。

然而，这三类安全并非静态存在，而是持续受到外部条件与结构环境变化的影响。

首先，经济结构与全球分工体系的变化，决定了国家在供应链中的嵌入深度与可替代性，从而影响其抵御冲击的内向安全能力与外向安全能力。供应链安全的根基是全球化生产分工形成的经济依存体系，该体系通过国际中间品贸易网络构建了复杂的双向依赖关系。从本质上看，这种经济相互依赖具有显著的双重性特征：一方面表现为进口国对出口国生产技术能力的依赖，另一方面则反映为出口国对进口国消费市场的依赖。对外依赖度高、供应来源集中度高的国家更容易受到外部冲击，而多元化的供应网络有助于增强经济体的替代能力与抗压韧性。^① 因此，提升供应链安全的关键途径之一是通过优化经济结构，降低对单一市场或产品的过度依赖。

其次，地缘政治与制度环境日益成为影响供应链稳定性的决定因素。在新冷战格局出现、技术“脱钩”趋势加剧的背景下，国家间政治关系的不确定性显著提升了跨境供应链运行的制度风险。^② 例如，俄乌战争引发的能源与粮食供应链中断，中美之间的科技出口限制与关税冲突及美国推动的“友岸外包”政策，均加剧了全球供应链的地缘化重组。此外，区域性制度安排也对供应链发展产生重要的塑造作用，改变国家在区域和全球产业网络中的相对地位，对外向安全和系统安全构成重要约束。如《美墨加协定》中关于原产地比例、最低工资标准等规定显著影响了汽车、电子等产业的布局选择，加快了制造环节“回流美国”的趋势。从这个维度看，供应链安全既取决于市场配置效率，也依赖于制度协调能力与对冲政治风险的能力。

最后，从企业策略与技术掌控能力出发，供应链安全还体现为微观层面上企业自身能力与创新能力的总和^③，其直接影响关键环节的控制力、价值链的主导力以及创新驱动动力，是构成供应链安全基础的核心变量。在全球不确定性增强的背景下，企业通过设置第二生产基地、中转地和避税港等方式实现布局多元化，以增强抗风险能力。同时，核心技术掌控与高端制造能力成

^① Zachary Williams et al., “Supply Chain Security: An Overview and Research Agenda”, in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Logistics Management*, Vol. 19, No. 2, 2008, pp. 254 - 281.

^② Youakim Badr and Jean Stephan, “Security and Risk Management in Supply Chains”, in *Journal of Information Assurance and Security*, Vol. 2, No. 4, 2007, pp. 288 - 296.

^③ Juha Hintsa and Ari - Pekka Hameri, “Supply Chain Security Management: an Overview”, i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Logistics Systems and Management*, Vol. 5, No. 3 - 4, 2009, pp. 344 - 355.

为影响国家安全战略的重要变量。若关键设备、原材料或制造工艺受制于他国，整个供应链将面临“卡脖子”风险。当前，中美两国在半导体、人工智能与稀土材料等领域的博弈，正是技术主导权争夺下供应链安全外化为国家竞争力的典型体现。从这一角度来看，提升供应链安全的关键在于实现核心技术自主可控，强化高端制造环节在本国的嵌入度，并增强企业应对制度变化的快速调整能力。

因此，供应链安全不仅关系到一个国家的对外依赖程度，还涉及国际制度带来的限制以及如何灵活应对突发风险，是一个复杂而综合的问题。在经济全球化与地缘政治的双重驱动下，供应链安全的边界不断演化，既要求国家从宏观制度与战略上提升韧性，也要求企业从微观组织与技术层面增强适应能力。下文将基于上述分析框架，聚焦美墨经济一体化进程中的供应链转移与中国供应链安全议题，通过分析中美墨三边贸易数据来评估中国在全球供应链重构背景下的安全韧性。研究主要运用中国海关总署进出口统计数据、美国人口普查局对外贸易数据、墨西哥中央银行贸易数据，重点考察中国对美墨市场的出口集中度变化，并针对部分关键产业进行深入分析。通过对三边贸易视角的数据分析，系统识别出全球供应链重构背景下中国供应链中的脆弱环节和潜在风险，为制定针对性的供应链安全政策提供数据支持。

二 从“去中国化”到“墨西哥承接”：供应链转移的背景与制度基础

在中美战略博弈持续升级、“去中国化”战略不断推进的背景下，全球供应链正加速朝区域化方向演变。美国推动供应链重组的关键路径如下：首先，通过“去中国化”战略实施技术封锁与贸易脱钩，推动全球制造业从中国向墨西哥等近岸地区转移；其次，依托《美墨加协定》调整原产地规则和投资审查机制，进一步巩固北美区域供应链的整合基础；最后，推动墨西哥政府通过近岸外包与“墨西哥计划”等政策工具，逐步形成“美国主导规则—墨西哥承接产能”的上下游合作格局。这三方面举措协同发力，不仅重塑了北美区域生产体系，还深刻影响了全球供应链的运行逻辑与主导权分布。

（一）中美博弈加剧：“去中国化”战略推动全球供应链向区域化转移

随着中美战略竞争的全面升级，尤其是在科技、安全和贸易等领域矛盾的集中爆发，“去中国化”逐渐成为美国的重要政策方向。在“国家安全”的逻辑驱动下，美国利用自身外向安全的优势，试图以制度性安排和政策工

具对全球价值链进行再塑，以削弱中国在关键产业链中的核心地位。这一过程已通过关税壁垒、技术封锁、强化同盟等多重机制体现出来。

在关税壁垒方面，美国关税工具放大了供应链重组的速度与方向选择。特朗普政府第一任期（2017—2021 年）是中美贸易关系发生系统性转变的重要阶段，也是中美墨三边供应链结构出现“脱钩—重构”转折点的起点。2018 年，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USTR）依据《1974 年贸易法》第 301 条对中国商品发起系统性调查，指控其存在知识产权侵权、强制技术转让等不公平贸易行为，并由此对 500 亿美元中国商品加征 25% 的关税，随后数轮加征使得征税商品总额升至 2500 亿美元。^① 特朗普政府在第二任期内将关税工具进一步制度化和战略化。其中最具突破性的是以“对等关税”原则为基础的新一轮征税方案，这不仅将关税作为限制中国商品出口的常规手段，更赋予其显著的地缘战略价值。2025 年 4 月 2 日，特朗普引用《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IEEPA），宣布对所有贸易伙伴设立 10% 的“最低基准关税”。^② 在 5 月的日内瓦会谈后，中美双方虽部分撤回了新增关税，但双边关税总体水平仍高于贸易战前，且若 90 天宽限期后双方未达成进一步协议，仍然存在重新加征关税的风险。

在技术封锁方面，美国通过贸易壁垒和出口管制，限制中国企业获取关键的生产设备和技术；同时，出台一系列显著且复杂的拦截措施，包括禁止美国企业向中国企业出售关键的半导体、操作系统和其他高科技组件。自 2019 年以来，美国政府以国家安全为由，逐步加强对中国高科技企业的出口管制。2019 年 5 月，美国商务部将中国华为公司及其多家关联企业列入“实体清单”，依据《出口管理条例》，要求向华为出口受管制商品必须事先申请许可。^③ 2020 年 8 月，美国进一步实施“外国直接产品规则”扩展版，禁止使用美国半导体设备或软件生产的芯片供应华为，此举严重冲击了华为的高

① “Four - Year Review of Actions Taken in the Section 301 Investigation: China’s Acts, Policies, and Practices Related to Technology Transfer, Intellectual Property, and Innovation”, Office of the United States Trade Representative, Executive Office of the President, 2024. <https://ustr.gov/>. [2025 - 06 - 25]

② “Fact Sheet: President Donald J. Trump Declares National Emergency to Increase Our Competitive Edge, Protect Our Sovereignty, and Strengthen Our National and Economic Security”, The White House, April 2, 2025.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2025/04/02/fact-sheet-president-donald-j-trump-declares-national-emergency/>. [2025 - 06 - 27]

③ U. S. Department of Commerce, Bureau of Industry and Security, “Addition of Entities to the Entity List”, May 21, 2019. <https://www.federalregister.gov/documents/2019/05/21/2019-10616/addition-of-entities-to-the-entity-list>. [2025 - 06 - 25]

端芯片供应链。拜登政府延续了这一政策，以供应链安全为由对中国发起“科技冷战”。2021年，拜登签署《安全设备法》，要求联邦通信委员会停止向被视为安全威胁的企业颁发新设备许可，导致华为等中国5G设备供应商基本退出美国市场。美国商务部工业和安全局（BIS）在2022年10月和2023年10月分别实施了针对中国先进半导体和计算机设备的出口管制措施，2025年3月进一步将包括54家中国企业和研究机构在内的实体加入“实体清单”，扩大对中国高技术领域的出口管制范围。^①

在强化同盟方面，美国加紧与其盟伴国家对中国进行“区域围堵”，如在5G网络建设、人工智能标准制定等领域积极拉拢欧盟成员、日本、澳大利亚等国家，构建旨在应对中国科技崛起的国际联盟。这种联合行动不仅加剧了中美科技竞争的激烈程度，也使国际科技合作面临新的挑战。具体而言，2020年新冠疫情暴发后，供应链严重依赖中国导致的风险加剧了美国和中国之间的紧张局势，美国政府加速推进一项旨在把中国挤出全球供应链的举措。为实现这一战略目标，美国推动创建了被称为“经济繁荣网络”（EPN）的“可信赖伙伴”联盟，以增强盟伴经济合作、供应链安全和技术共享。该联盟旨在通过减少对中国供应链的依赖，确保成员国关键产品和原材料的供应安全，增强联盟内部的投资和贸易机会，推动成员国经济发展。^② 2021年6月，在美国主导下，七国集团（G7）开启所谓“重建更美好世界”计划（B3W），试图通过为发展中国家提供高质量的基础设施投资，与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竞争。

在美洲地区，2021年美国 and 墨西哥成立了供应链工作组，旨在解决美洲区域的经济问题。2022年4月，美国众议院西半球公民安全、移民和国际经济政策小组委员会成员马克·格林（Mark Green）提出了《西半球近岸外包法案》。该法案对从中国迁往拉美的企业提供低息贷款和15年免税优惠，旨在鼓励产业回迁，以增强地区经济联系，提升地区生产能力。^③ 2022年6月，

^① U. S. Department of Commerce, Bureau of Industry and Security, “Additions and Modifications to the Entity List”, March 28, 2025. <https://www.govinfo.gov/content/pkg/FR-2025-03-28/pdf/2025-05426.pdf>. [2024-07-16]

^② “US Creates ‘Economic Prosperity Network’ on Efforts to Restructure Global Supply Chain”, Vietnamtimes, May 13, 2020. <https://vietnamtimes.org.vn/us-creates-economic-prosperity-network-on-efforts-to-restructure-global-supply-chain-20290.html>. [2024-07-15]

^③ 陈积敏：《美国构建“三位一体”供应链安全体系》，载《中国投资（中英文）》，2022年，第74-76页。

拜登在美洲峰会上宣布“美洲经济繁荣伙伴”计划，旨在加强美国与西半球的经济联系，遏制中国“染指”拉美。^① 同月，美国在加拿大多伦多的勘探开发者协会大会上宣布成立旨在加强关键矿产供应链合作的“矿产安全伙伴关系”（MSP）。截至2023年7月，“矿产安全伙伴关系”成员已经覆盖了澳大利亚、加拿大、芬兰、法国、德国、印度、日本、韩国、瑞典、英国、美国以及欧盟。拉丁美洲作为资源丰富的地区，未来美国可能通过将“美洲经济繁荣伙伴关系”和“矿产安全伙伴关系”相结合，限制中国在拉美地区的矿产资源投资和开发。

（二）《美墨加协定》：在制度上强化美墨供应链整合

美国、墨西哥、加拿大三国于2020年7月正式启动《美墨加协定》，对原产地规则、劳工标准、投资和数字贸易等方面进行了全面升级。这些新规则旨在深化北美区域价值链整合，通过强化原产地规则、调整累积规则及增设非关税壁垒，不仅强化了北美地区的系统安全，还对第三方国家（特别是中国）通过墨西哥中转对美出口的贸易策略产生制约。

在原产地规则方面，《美墨加协定》显著提高了区域价值成分要求，例如将汽车产业的区域价值含量（RVC）标准从62.5%提升至75%，并规定40%~45%的整车价值须由时薪不低于16美元的北美劳工生产，同时要求70%的钢铁与铝材料源自北美。^② 在累积规则方面，《美墨加协定》允许成员国之间的原材料与零部件互供计入区域价值成分，从而促进北美供应链的内部协作。然而，协定同时严格规定“实质性加工”要求，明确禁止通过简单转运或重新包装等非增值性操作获取原产地资格。这些条款旨在确保区域供应链的深度整合，防止非成员国通过简单组装或转口贸易规避关税。此外，《美墨加协定》通过非关税壁垒条款进一步强化了对非成员国的制度性约束。其中，第32.10条“非市场经济国家”条款规定，任何成员国与非市场经济体签署自贸协定须提前通知其他缔约方，后者有权审查协定内容并保留退出的权利。这一条款被视为美国遏制墨西哥与中国深化经贸合作的制度工具，从而维护北美贸易体系的封闭性。

总而言之，从《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转向《美墨加协定》使得美墨间的

^① 孙成昊、申青青：《拜登政府的供应链重塑战略：路径与前景》，载《美国研究》，2023年第1期，第113-137页。

^② United States International Trade Commission, *USMCA Automotive Rules of Origin: Economic Impact and Operation, 2023 Report*, Washington, D. C.: U. S. International Trade Commission, July 2023.

经济联系不断加深，全球供应链从“全球化”转向“区域化”。墨西哥和加拿大两国合计承担了美国超过 1/4 的进口供应。未来，美墨经济一体化可能进一步发展，成为美国对抗全球经济力量尤其是中国竞争力的一个重要战略工具。由于《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已经将墨西哥与美国经济深度绑定，面对《美墨加协定》限制性要求更高的原产地规则，墨西哥在对美依赖与对华合作之间陷入两难。

（三）墨西哥政策响应：近岸外包趋势下出台“墨西哥计划”

美国通过与盟国和合作伙伴建立紧密的经济和贸易关系，从离岸外包转向近岸外包和友岸外包，试图在周边国家及主要地区形成价值链的多点布局，避免对中国供应链的过度依赖。离岸外包作为最初的全球供应链管理模式，将生产和服务外包给中国、越南等生产成本较低的国家，使许多西方企业能在全球市场中保持竞争力。然而，随着全球政治经济环境的变化，特别是中美贸易摩擦和技术冲突的加剧，近岸外包和友岸外包逐渐成为替代离岸外包的新选择。近岸外包指的是将生产和服务外包给地理上邻近的国家，这不仅可以降低运输成本，还能更好地应对区域性市场需求变化。友岸外包则是将外包业务转移到与本国关系友好的国家，其实质是一种“政治外包”，是经济战略的政治化表现，核心目标是构建由美西方主导的“小院高墙”。^①在中美间政治风险与日俱增的情况下，美国更倾向于将产业外包至邻近的加拿大和墨西哥等国。

在地缘政治格局不断变化、竞争日益激烈的背景下，墨西哥凭借其地理位置、成本、生产能力、自由贸易协定等优势，具备了承接美国供应链转移的优势，尤其是在汽车、电子和纺织等劳动密集型产业。^②除了地理位置优势外，墨西哥的劳动力成本相对较低。2020 年墨西哥的平均工资为每小时 4.82 美元，相比之下，中国的平均工资为每小时 6 美元。同时，墨西哥拥有较为深厚的工业基础和生产能力，在汽车、电子和航空等高附加值产业领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此外，在国际贸易方面，墨西哥是全球签署自由贸易协定最多的国家之一。墨西哥作为世界贸易组织的成员，签署了 13 个涵盖 50 个国家的自由贸易协定，让墨西哥市场成为全球最具竞争力和开放性的市场之一。

^① 陈俊豪：《美国“友岸外包”对中国制造业的影响与对策——基于全球产业链重构视角的分析》，载《时代经贸》，2024 年第 5 期，第 108 - 112 页。

^② Celso Garrido, *México en la Fábrica de América del Norte y el Nearshoring*, Santiago: CEPAL, 2022, p. 84.

在美国推动全球供应链重组与友岸外包的大背景下，墨西哥顺势推出“墨西哥计划”，试图承接来自中美两国的制造业转移，积极融入全球供应链重组进程。2025 年 1 月 13 日，墨西哥总统辛鲍姆正式发布“墨西哥计划”，其战略核心明确聚焦于承接美国近岸外包，强调墨西哥在区位优势与制度配套方面的比较优势。根据规划，墨西哥拟通过约 2770 亿美元的总投资，推动约 2000 个涵盖基础设施建设、能源转型、制造业升级与社会福祉的重点项目，力争在 2030 年前使墨西哥跻身全球前十大经济体。^① 特别是在美墨边境产业带的发展布局，凸显出墨西哥在《美墨加协定》框架下深化区域价值链整合的战略意图在产业方向上重点聚焦汽车制造、电子设备与医疗用品等关键领域，契合美国推动供应链“去中国化”的政策重心。这一产业政策显示出墨西哥谋求在全球生产网络重构中确立其作为美国近岸外包政策的核心受益国与关键合作伙伴的战略地位。

三 美墨经济一体化中的供应链转移对中国供应链安全的影响

在全球供应链重组与中美战略竞争持续升级的背景下，中国所面临的供应链安全挑战日益严峻。尤其是美墨经济一体化的快速推进，不仅重塑了区域产业分工格局，也对中国的对美出口份额、中间品控制能力与制造业布局产生了深远影响。面临对美出口份额下降、制造环节外迁与技术封锁等压力，中国供应链暴露出其外向安全的脆弱性。在此背景下，中国积极推动出口市场多元化，拓展与新兴经济体的贸易合作，初步增强了内向安全韧性，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对特定国家和单一市场的结构性依赖。特别是，中国凭借中间品生产优势及中墨供应链合作，维系其在区域价值链中的重要地位，有效巩固了外向安全的结构支点，亦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全球供应链系统安全。与此同时，中国持续加大自主创新投入，推动高端制造业发展与关键技术突破，显著增强了供应链内向安全的自主调节能力，并在若干关键领域重塑对外供应的主导优势，从而进一步夯实其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外向安全地位与战略引领能力。

（一）对美出口缩减与对新兴市场出口扩大：中国外贸格局的双向重构

在中美贸易战与全球供应链重组的双重背景下，墨西哥已成为这一地缘

^① “Plan México 2025. Estrategia de Desarrollo Económico Equitativo y Sustentable para la Prosperidad Compartida: Primer Borrador”, Gobierno de México, 2025. <https://www.planmexico.gob.mx/>. [2025 - 06 - 22]

经济格局变动的最大受益者。凭借地理位置的邻近优势以及《美墨加协定》所赋予的免税准入权，部分原本面向美国市场、在中国境内开展的制造环节正加速向墨西哥转移。

自中美贸易战爆发以来，美国对中国制造业的依赖程度呈显著下降趋势，使中美贸易格局恶化。^① 中国在美国进口市场中的份额持续萎缩。从图 1 可以看出，自 2017 年达到峰值（21.6%）以来，截至 2025 年 4 月，该份额累计下降约 12 个百分点。与此同时，墨西哥对美国的出口则不断增加。2023 年，墨西哥对美国的出口总额达到 4750 亿美元，首次超过中国的 4269 亿美元，使墨西哥跃升为美国最大贸易伙伴。这一趋势在 2024 年得到强化，墨西哥对美出口超过 5000 亿美元，占美国进口市场份额的 15.5%，对美贸易地位持续上升。这种结构性调整与《美墨加协定》推动的区域价值链整合密切相关，中国的部分中低端制造业转移到墨西哥。具体而言，墨西哥在家具与室内装饰（HS94）、玩具与运动设备（HS95）等劳动密集型领域表现出明显竞争优势；在电气及电子设备（HS85）、汽车及零部件（HS87）等资本或技术密集型产业中，也借助制度与区位优势显著扩大了对美出口规模。^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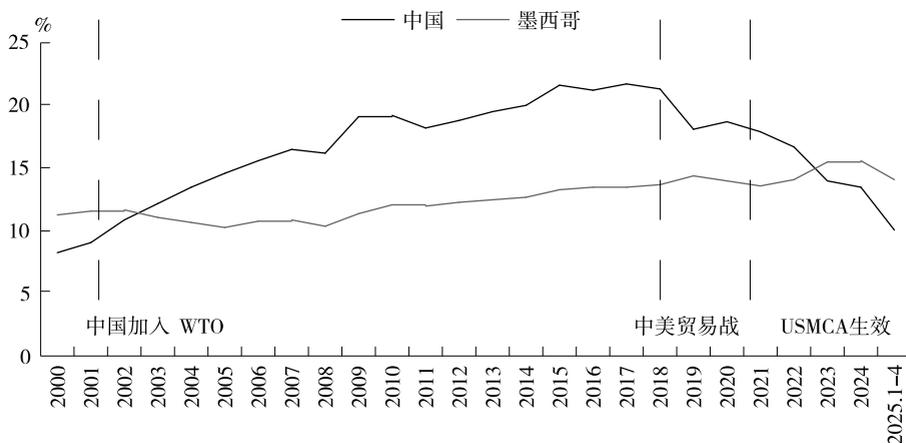


图 1 美国从中国和墨西哥进口市场份额变化 (2000—2025 年 4 月)

资料来源：根据美国人口普查局数据绘制。https://www.usa.gov/census-data. [2025-06-22]

^① Ignacio Santillán Luna et al., “Practical Strategies for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Mexico: Nearshoring Trend”, in *Mercados y Negocios*, Vol. 25, No. 52, 2024, pp. 109-130.

^② 《中美关系改变贸易格局：中国已不是美国最大进口国》，纽约时报中文网，2024 年 2 月 8 日。https://cn.nytimes.com/business/20240208/united-states-china-mexico-trade/. [2024-07-11]

在电气及电子设备领域（如手机、半导体、集成电路等），这一变化趋势尤为显著。在过去20年里，中国作为全球电子产品装配中心，曾在美国电气及电子设备进口市场中占据显著份额。2018年起，美国对中国电子类产品普遍加征25%关税，这加速了部分制造环节从中国向墨西哥和东南亚国家的转移。墨西哥早在《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时期就建立了成熟的电子制造业基础，中美贸易摩擦进一步强化了其区位优势。2017—2024年间，中国在美国电气及电子设备进口市场中的份额已下降16个百分点；同期，尽管墨西哥在该市场的份额占比提升有限，但其出口额持续增长，反映出在“去中国化”趋势下北美区域制造能力逐步增强（见图2）。作为应对策略，许多中国电子企业选择在墨西哥设厂组装产品后再出口美国，以规避高额关税的影响。美国从墨西哥进口的电子终端产品增多，与此同时，墨西哥从中国进口的关键零部件也相应增加。这表明中国在整个电子产业链中正向上游高附加值环节（零部件、模组）迁移，而最终组装环节则更多地布局在墨西哥或东南亚国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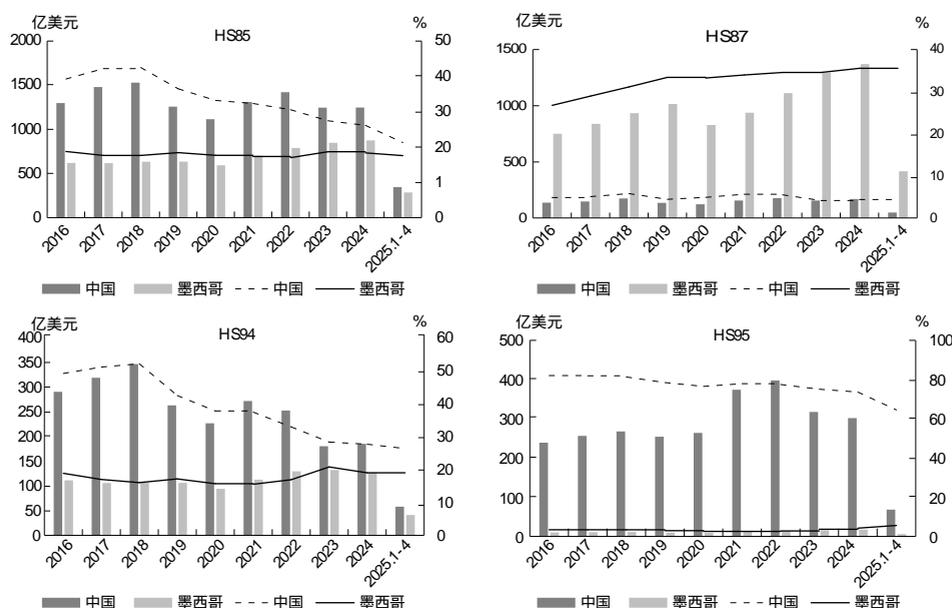


图2 美国从中国和墨西哥不同产业进口的金额和占比变化（2016—2025年4月）

注：HS85指电气及电子设备产业，HS87指汽车及零部件产业，HS94指家具与室内装饰产业，HS95指玩具与运动设备产业。

资料来源：根据美国人口普查局数据绘制。https://www.usa.gov/census-data.[2024-06-22]

在汽车及零部件领域，原产地规则显著强化了北美区域生产的竞争力，

促使产能加速向墨西哥集中。《美墨加协定》实施后，墨西哥对美国汽车及零部件出口持续增长。从图 2 可以看出，截至 2025 年年初，墨西哥在美国汽车及零部件进口总额中所占比重上升至 35%，较 2017 年提升 6 个百分点；同期，中国对美同类产品出口则呈下降趋势。凭借符合原产地规则的零关税准入与地理区位优势，墨西哥稳固了其作为美国最大汽车供应链来源国的地位。为规避美国对华加征关税引发的政策不确定性，通用、福特等汽车制造商加速将原位于中国的产能迁移至墨西哥，进一步推动北美汽车供应链的区域化重组。

在家具与室内装饰产品领域，自 2018 年以来，中国在美国进口市场中的份额持续下滑。至 2024 年，该份额较 2018 年下降 26 个百分点；同期，美国自墨西哥进口的份额上升约 3 个百分点（见图 2）。在玩具与运动设备领域，中国对美国出口的份额显著下降，墨西哥对美国出口的份额有所增加，但其总出口额较小，因为这部分产能从中国逐渐转移至东南亚国家，特别是越南。在 2010—2024 年间，美国从越南进口的玩具与运动设备从 1.42 亿美元迅速增长到 28.38 亿美元，增幅超过 20 倍，尤其自 2019 年以来呈爆发式增长，显示出越南已成为重要的玩具生产转口基地。^①

尽管中国对美国的出口规模有所下降，但对新兴经济体的出口规模则持续增长，整体贸易结构呈现出日益多元化的趋势。中国不断拓展与东盟、拉丁美洲、中亚、非洲等新兴市场的经贸联系。2017—2024 年间，上述地区占中国出口总额的比重较中美贸易战前分别提升 4.06、1.96、0.85 和 0.81 个百分点。若纳入中东欧国家，新兴经济体对中国出口增量的贡献率接近 60%，成为贸易多元化的核心引擎。^② 2024 年，中国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经贸关系进一步深化，其占中国对外贸易总额的比重首次突破 50%，标志着中国外贸布局的结构性转变。其中，对“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出口额同比增长 9.6%，远超全国出口平均增速；而美、日、韩等传统市场在中国出口中占比下降。整体来看，中国对外贸易呈现新兴市场加速拓展与传统市场有序调整并存的格局，出口结构更加多元化。

^① “U. S. Census Data”，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https://www.usa.gov/census-data>. [2025-07-15]

^②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署：《统计月报》，2024 年。 <https://online.customs.gov.cn/>. [2025-06-2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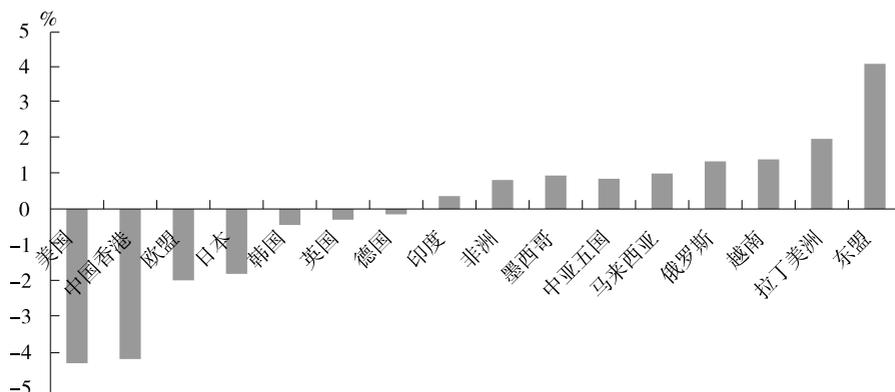


图 3 中国对全球主要经济体出口的比重变化（2017—2024 年）

资料来源：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署数据绘制。https://online.customs.gov.cn/. [2025 - 06 - 22]

（二）中墨供应链深度合作：中国中间品的关键支撑作用

尽管全球贸易格局已被重塑，但美国供应链仍深度嵌入中国制造业体系，中国作为墨西哥中间品核心供应方的地位显著强化，中墨供应链协同性持续深化。由于墨西哥本土供应链发展不完善，其对美制造业出口中的中国增加值含量持续攀升。在汽车、电子家电、医疗器械等领域，墨西哥大量进口中国零部件和原材料，在本地组装后再出口至美国。这一方面源于中资企业通过在墨西哥投资设厂融入北美供应链，另一方面也是企业为规避美国关税，主动依托墨西哥贸易优势调整供应链的结果。实证研究显示，墨西哥自华进口与对美出口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性（相关系数 $r = 0.9560$, $p < 0.01$ ）。^①通过整合中国提供的中间品，墨西哥实现对美大规模出口并强化其在中美区域价值链中的枢纽角色，中墨供应链合作不断加深。^②

墨西哥自中国进口的资本品与中间品增长迅速。2001—2024 年间，中国在墨西哥进口市场中的份额提升了 19 个百分点；2024 年墨西哥自华进口额达 1291.39 亿美元，同比增长 13.6%。从进口结构来看，2024 年墨西哥从全球主要进口商品中，汽车零部件及配件（343.31 亿美元）和集成电路（257.78 亿美元）位居前列，其中中国分别贡献了 47 亿美元和 83 亿美元，在各自品

^① Xuedong Liu and Gerardo Covarrubias, “Evolution of Mexico’s Trade Relations with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1993–2020”, in *Problemas Del Desarrollo*, Vol. 54, No. 212, 2023, pp. 155–179.

^② Shuo Shi and Hanzhen Ouyang, “Is a Mexico–China Competition Emerging in US Supply Chains? 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in *Universal Journal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Vol. 3, No. 1, 2023, pp. 19–31.

类中的进口占比达到 14% 和 32%。^① 同时，中国还是墨西哥最大的半导体供应国，占据其进口市场份额的 43.2%。这一贸易格局的演变反映了北美区域供应链重组背景下“中国制造 + 墨西哥组装”新型分工模式的形成。

2024 年墨西哥汽车零部件进口来源国份额分布显示：美国占其进口总额的 52%，保持主导地位；中国以 14% 的份额位列第二，供应量较 2010 年增长了 6.2 倍（从 6.48 亿美元增至 47 亿美元）。^② 自 2015 年起超越日本、德国成为墨西哥第二大供应国后，中国连续多年保持这一地位。据墨西哥汽车零部件行业协会（INA）统计，2023 年有 33 家中资汽车零部件企业在墨西哥设有生产基地，当年对美出口额达 11 亿美元，较 2021 年增长 54.7%。^③

在集成电路和半导体领域，以中国为首的“亚洲工厂”在北美供应链体系中的战略地位日益凸显，其对区域产业竞争力的提升效应深刻地影响了墨西哥的工业化进程。作为全球第十大半导体进口国，墨西哥半导体进口额占其总进口额的 4.3%，凸显其对半导体进口的高度依赖。亚洲供应商（中国、韩国、日本、马来西亚、越南）占墨西哥半导体进口的 80%，其中中国（含台湾地区）占比 43.2%。这些关键中间品深度嵌入汽车等墨西哥支柱产业，既体现了全球价值链的深度重构，也反映出中国制造的中间产品在技术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产业领域形成的比较优势。

（三）出口管制倒逼创新：中国高端产业的技术性突破

随着国际地缘政治形势的变化，美国对中国的技术封锁日益加剧。从特朗普政府到拜登政府，美国对中国的科技限制措施全面加强，特别是通过“实体清单”这一机制，对华经济制裁持续升级。美国通过各种手段限制中国企业在高科技领域的发展，其中最显著的措施是对航空航天、机械制造、半导体、芯片、人工智能及相关技术的出口管制，直接影响了中国在关键技术领域的自主创新和产业升级。例如，近年来美国对中国主要科技公司如华为、中兴等实施了出口禁令，限制它们获得高端芯片和其他核心技术。美国的出口管制对中国高新技术行业的技术创新能力产生了逆向效应，限制了该行业

^{①②} Secretaría de Economía, Gobierno de México, “Data México”. <https://www.economia.gob.mx/datamexico/>. [2025-06-22]

^③ “Portal Institucional del INA”, Instituto Nacional de Administración Pública (INA). <https://ina.com.mx/>. [2025-06-22]

的进一步发展。^① 美国的技术封锁对中国半导体供应链造成了前所未有的影响，导致中国不仅无法进口顶尖芯片，也难以获得研发高级半导体和超级计算机所需的关键资源，甚至连用于制造半导体设备的原产部件、技术和软件也无法得到。

然而，美国对中国的出口管制对中国企业的创新产生了复杂影响：尽管管制初期抑制了中国企业的创新产出，但随着时间推移反而会激励中国企业加大创新投入。^② 美国的科技管制促使中国企业向内生创新转变，减少低质创新产出，抑制管理者的短视行为，提升技术创新水平，以抵御贸易战和技术封锁的影响。^③ 技术断供导致中国国内某些零售商只能从本地厂商购买商品，反而有助于激励本地厂商进行更多的创新。因此，美国的管制不仅推动了中国制造业的创新，还改善了全球供应链中的合作方式。^④ 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24 年中国研发（R&D）总投资达到 36130 亿元，实现了 8.3% 的同比增长率，研发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达 2.68%。其中，基础研究的资金投入为 2497 亿元，同比增长 10.5%，占总研发支出比重的 6.91%。^⑤ 中国知识产权创造能力持续增强，2024 年年底国内（不含港澳台地区）发明专利有效量达到 475.6 万件，展现出蓬勃的创新活力。同期，每万人拥有的高价值发明专利为 14 件。从创新主体来看，中国企业创新活力持续释放，国内拥有有效发明专利的企业数量达到 49.7 万家，同期增长 6.9 万家。^⑥ 特别是在电子设备、计算机、通信等重点受管制行业，专利申请数量正在增加，这表明中国正在逐步克服美国对华出口管制的束缚。^⑦ 美国对中国的出口管制改善了中国企业的专利申请结构，提高了中国企业的创新总产出，促使中国企业

① 袁慧煜：《美国出口管制对我国高新技术行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及对策研究》，江西财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22 年。

② 刘斌、李秋静：《美国对华出口管制与中国企业创新》，载《财经研究》，2023 年第 12 期，第 19-33 页。

③ 朱红武、任培民：《技术封锁对制造业企业技术创新水平的影响研究》，载《青岛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24 年第 3 期，第 120-127 页。

④ 寇宗来、孙瑞：《技术断供与自主创新激励：纵向结构的视角》，载《经济研究》，2023 年第 2 期，第 57-73 页。

⑤ 《2024 年我国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超过 3.6 万亿元》，国家统计局，2025 年 1 月 23 日。https://www.stats.gov.cn/sj/zxfb/202501/t20250123_1958421.html. [2025-06-22]

⑥ 《2024 年中国专利调查报告》，国家知识产权局，2025 年 1 月。https://www.cnipa.gov.cn/art/2025/1/22/art_88_197320.html. [2025-06-22]

⑦ 谭茜文：《美国出口管制对我国高新技术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南京财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24 年。

进行高质量创新，并引发了“逃离竞争效应”。^① 中国制造业正在向价值链中高端领域发展，在全球垂直分工中依靠成本优势的模式将逐渐转变。^②

在新兴技术领域，如无人机技术、内燃机技术，中国对美国的技术独立程度显著提高。尤其是在无人机领域，中国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技术领先，实现了对美国的反向“卡脖子”。^③ 在芯片领域，出口限制反而激励了中国芯片业的持续增长。华为被断供后，中国大陆最重要的芯片制造公司中芯国际相继突破了 28 纳米、14 纳米、12 纳米、“N + 1”（10 纳米）制程芯片的量产，“N + 2”（7 纳米）制程芯片的技术开发也已经完成。^④ 2025 年 4 月，复旦大学完成全球首款基于二维半导体材料的 32 位 RISC - V 架构微处理器“无极”流片验证。该芯片厚度仅 0.65 纳米，集成了 AI 优化系统，72 小时内可解析 10 万组参数，待机功耗为传统英特尔芯片的 1/5。^⑤ 如果中国将原本用于进口芯片的巨额资金（年均约 4000 亿美元）转投国内市场研发，中国国内的芯片行业有潜力最终实现赶超。^⑥

四 针对中国供应链安全的策略与建议

随着国际经济环境的持续演变和技术革新的快速推进，全球供应链正处于关键变革时期。面对这一挑战，中国必须采取有力措施，既要筑牢抵御外部冲击的防线，也要确保在全球竞争中的活跃度和影响力。中国应通过强化自主创新、促进“双循环”、推动国际合作并加强与墨西哥等关键伙伴国的经济协作，实现供应链的多元化。

① 魏浩、连慧君、巫俊：《中美贸易摩擦、美国进口冲击与中国企业创新》，载《统计研究》，2019 年第 8 期，第 46 - 59 页。

② 马天月、丁雪辰：《中美贸易摩擦与我国企业创新路径分析》，载《科学与科学技术管理》，2020 年第 11 期，第 3 - 15 页。

③ Pengfei Han, Wei Jiang, and Danqing Mei, “Mapping US - China Technology Decoupling, Innovation, and Firm Performance”, in *Management Science*, Vol. 70, No. 12, 2024, pp. 8386 - 8413.

④ 寇宗来、孙瑞：《技术断供与自主创新激励：纵向结构的视角》，载《经济研究》，2023 年第 2 期，第 57 - 73 页。

⑤ 《复旦团队研制二维半导体芯片‘无极’》，人民日报，2025 年 4 月 3 日。<https://www.peopleapp.com/column/30048694074-500006180015>. [2024 - 07 - 30]

⑥ 《美国对华芯片封锁，这篇报道揭了底》，央视网，2023 年 7 月 9 日。<https://news.cctv.com/2023/07/19>. [2024 - 07 - 30]

（一）加强供应链的自主创新能力，聚焦新质生产力发展

中国正处于产业升级和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时期。在全球化背景下，供应链的稳定性和创新能力直接关系到国家的经济安全和国际竞争力。因此，加强供应链的自主创新能力，聚焦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是中国应对未来挑战、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策略。新质生产力是指通过科技创新和管理创新，提升供应链各环节的效能和价值，实现从传统生产方式向现代智能化生产方式的转变。它不仅包括技术创新，还涵盖了强化企业主体、优化营商环境等全方位的创新实践。

首先，中国需要进一步优化供应链结构，提升关键领域的自主创新能力。这意味着在半导体、人工智能、生物技术、新能源和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大研发投入，支持科研机构和企业进行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的突破。政府可以通过提供税收优惠、研发补贴、创新信贷和风险投资等方式，激励企业加大科技创新投入。企业、政府和科研机构应携手合作，形成研发合力，增加对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资金投入。其次，强化企业在供应链中的核心竞争力也至关重要。企业是供应链创新的主体。加强企业内部的技术改造和管理升级，促进产学研用紧密结合，是提升供应链创新能力的有效途径。要鼓励企业通过合作与兼并，优化资源配置，形成规模效应和集群优势，以进一步提高整个供应链的效率和抗风险能力。最后，有必要优化创新环境，营造良好的产业生态。创新不仅需要资金和技术支持，还需要良好的产业生态。这要求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打击侵犯知识产权的行为，保护创新者的合法权益，优化市场监管，消除行业壁垒，促进公平竞争。

（二）促进国内外双循环，提高全球竞争力

为应对中美“脱钩”的挑战及其对中国经济可能造成的孤立效应，确保国内供应链的安全和稳定，中国必须加强内部市场的发展并同时拓展对外经济联系，实现国内外双循环战略。通过充分利用国内外市场和资源，积极参与国际分工，推动经济的快速发展，并形成全面开放的经济格局。为了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中国需要进一步加强国内与国际市场的联通，充分发挥国内国际两大市场、两种资源的作用，提升在全球进行资源配置的能力，争取在开放发展中取得战略主动权。

第一，坚定不移地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努力打造强大的国内市场，利用国内经济的强大循环来吸引全球资源。中国拥有庞大的消费市场和成熟的制

制造业基础，应进一步提升科技创新能力、优化产业结构、加强信息化和智能化改造，推动产业向高附加值和技术密集型转型。通过不断培养和拓展国内市场，生产更多高品质产品以满足国内消费者的需求，实现更高水平的动态平衡，依托国内市场的广泛性实现高质量发展。第二，中国应积极向国际价值链的中高端迈进。要加强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推动从低附加值向高附加值产业转型，尤其是向技术密集型和创新驱动型产业转型。通过政策激励和投资引导，加快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提升这些产业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利用超大市场规模的优势，推动以创新为驱动的发展，不仅要有效利用全球通用技术，还要在关键技术领域实现突破，以提升产业技术水平，不断提升在国际供应链中的地位。第三，实施高水平的对外开放政策。以国内市场为基础并不意味着仅依赖国内资源或放弃国际市场，而是要根据国际经济环境的变化，利用中国的市场规模优势，促进国际合作，吸引全球优质资源，实现国内国际市场的双向促进，从而推动高质量发展。通过实施双循环战略，中国不仅能有效应对国际环境的不确定性，还能通过提高自身的创新能力和产业竞争力，实现供应链的安全健康发展。这将为中国经济提供更强的内生增长动力，同时也有助于推动全球经济的稳定与发展。

（三）推动在墨西哥本土化布局，强化风险规避机制

对于中国企业而言，应在《美墨加协定》框架下制定审慎而灵活的本土化发展战略，借助墨西哥市场实现对美出口。

首先，在生产层面，应通过在墨西哥建立具备实质性制造能力的基地，提升原材料采购与劳动力雇佣的本地化比例，以符合原产地规则要求，同时保留部分核心零部件的全球供应优势，以实现效率与质量的平衡。在产业选择方面，应该优先布局家电、消费电子、汽车零部件等对美敏感度较低的领域，规避通信设备、先进半导体等高风险行业，以降低地缘政治干扰带来的不确定性。

其次，在企业层面，应高度重视《美墨加协定》在劳工权益、环境标准等方面的规定，通过雇佣本地员工、参与社区建设等方式改善社会责任形象，从而提高在北美市场的制度适应性 with 长期发展能力。简单的转口贸易模式在当前形势下已不可持续，中国企业必须真正融入墨西哥本地制造生态，将其视为北美供应链体系中的重要节点，而非规避关税的临时通道。

最后，在制度环境层面，还需密切关注美墨政策协调动向。考虑到美国可能通过外交与监管手段施压墨西哥加强对中资项目的审查，中国企业应保

持高度的政策敏感性，适时调整投资路径与运营策略。总体而言，只有坚持“本土化+合规化”双重导向，企业才能在制度约束下实现对美出口的可持续布局，并提升其在北美区域价值链中的嵌入程度与战略韧性。

五 结语

在美墨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美国将供应链从中国逐渐转移至墨西哥，这一战略性举措重塑了全球制造业和贸易的地理政治格局。这一变革不仅加深了美墨之间的经济联系，而且对中国在全球供应链中的地位造成了显著影响。

将供应链转移至墨西哥只是美国与中国“脱钩”的一种策略，其最终目的仍是使制造业回流至美国本土。尽管美国和墨西哥在《美墨加协定》下的合作进一步加深，但在移民、关税、毒品及环境等问题上，两国间的矛盾仍然显著，这凸显了美墨双边关系的复杂性和挑战性。这些问题不仅影响了两国间的经济合作，也触及了更广泛的社会和政治问题。《美墨加协定》旨在促进北美区域自由贸易，但实际操作中，关于汽车制造、农产品等关键行业的关税争议频发，使得美国和墨西哥在经济合作中时常发生摩擦，影响了供应链的稳定性和企业的经营策略。同时，毒品贩运问题在美墨关系中尤为突出，墨西哥的跨国毒品犯罪活动对美国社会安全构成严重威胁。尽管美国试图通过加强与墨西哥的经济绑定来实现对中国的“脱钩”战略，且墨西哥的地理优势和成本效益使其成为美国供应链重组的关键节点，但上述结构性问题仍未得到有效解决。

美墨之间的经济摩擦及政治不协调在一定程度上为中墨合作开辟了新的路径。特朗普重新执政后，美国的关税“大棒”导致全球贸易合作面临巨大的风险，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使全球供应链陷入更深的确定性。全球供应链的重塑可能带来新的贸易壁垒和市场分割，对此，中墨双方应通过构建更广泛的合作网络来优化自己的国际布局。中墨合作可以帮助双方企业更好地整合进全球供应链，为墨西哥带来资本、技术和市场的多元化，使其能够减少对美国市场的依赖，并在保证中墨两国各自国家利益的同时，促进区域和全球的稳定与发展，构建一个更加开放、互利的国际环境，应对全球经济中的不确定性和挑战。

(责任编辑 黄念)